

姚大力诠释如何从历史脉络观照未来

“人活在文化里，而文化活在历史里，要了解自己和别人，就要了解历史。”4月2日下午，伴随掌声，文科资深教授、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姚大力走上相辉堂北堂讲台，面向中文、历史、哲学、外文、新闻和马院六个院系的2023级本科新生，以《从历史的脉络观照未来》为题，开讲“强国之路”思政大课。

历史的光从身后照来 也会照亮前方的路

为什么要学习历史？课程一开场，姚大力向台下的同学们抛出问题。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在姚大力看来，这是面对文化的提问。而面对文化的提问，就是面对历史的提问。如果更进一步追问，我们为什么要了解历史，姚大力的回答是：“为了解而了解”和“为行动而了解、而动员”。

“为了解而了解”，这是追求学问最纯粹的动机，姚大力称它为做学问的“原动力”，即对某一种未知的强烈的好奇心。“要想掌握一门学问，没有好奇心，没有强烈的求知欲，是不大可能学得好的。”

“大家可能会追问，我为什么要好奇心？也许，一个最简单的回答是：没有为什么。我们不



▲ 姚大力教授开讲“强国之路”思政大课

是为了准备撤离可能要毁灭的地球而探索星空，我们也不是为了测量泛滥的河滩面积而对严密而美丽的几何产生兴趣。”姚大力对台下青年学子说。

任何针对历史的提问都暗藏着对现实的关怀。面对人口压力、生态失衡等现实问题，我们会想到“历史上的人，也面对过我们今天这样的困境吗？”引述卡特的观点，姚大力表示，认识历史时，我们总绕不开过去和现在之间的相关性，来自现代的提问，可以推动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发现历史。“历史从身后投来一束光，还会照亮前方的路。”它把我们过去的回忆、对现在的认知和对明天的展望串联在一起。

开放性和多元性是理解中华文明的关键词

要想了解中国文明几千年的发展，在姚大力看来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是“开放性”。

大屏幕上，地图显示着夏、商、西周“三代”的地理位置，从“三代”互动交流中产生汉族祖先人群，到良渚文化的发掘，再到“中部亚洲廊道”与跨农业一流动畜牧业“两栖”人群……姚大力表示，中华文明从最早开始，就是在和外部文明不断交流的过程中孕育和发育的。

有趣的是，伴随物种和技术东传的，还有它们的名称。姚大力举例说，“马”的古汉语读音

和这个名词的印欧语词根的发音十分相近，而这种读法也明显反映在现代西语之中。”汉字“牛”“车”读音的来源也是如此。姚大力提出，“羊”的古汉语读音，也是来自它的印欧语词根。

小麦、胡床（交椅或太师椅）、车辆、烟草、番薯、棉布、白银、早期近代基督教和火器，“这些对中国人基本生活发生重大改变、重大冲击的东西都来自于中国以外的地区。”在姚大力看来，人们通常认为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主要是实现远程商品交换功能的网络，这个见解或许需要修改。“其实‘丝绸之路’更重要的历史意义，体现在物种、技术、观念、语言和宗教之间的传播与交流方面。”

开放性之外，姚大力揭出理解中华文明的第二个关键词——多元性。

“中华文明是一个多元统一的文明，是好多文明融合形成的。它并不像咖啡粉融于水中，变得均质化，而是连续的、统一的、包容的文明。”

这种区分何以重要？姚大力认为，这关乎“中国怎么来，又要往哪里走。”“在我提出上述问题前，大家可能并没意识这些可以成为‘问题’。你们中的大多数未来不会去专门研究历史，但无论未来大家从事什么工作，都应该成为所在领域的‘国家队’，就像排球运动中

的‘超手扣球’一样，将击球点置于拦网队员的手指高度之上。”

伟大文明 需要伟大的历史书写者

在中国古代，为求知或为实用而研究历史，分别出现过两个非常伟大的典范——司马迁和司马光。在姚大力看来，自《史记》起，对过程意识才被植入历史书写，“在司马迁之前，没有中国人把历史作为一个贯通的整体过程去理解。”而把这一史学创举与司马迁的人生遭遇结合起来看，让我们更深刻地体验到，在说出“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句话时，他心中的坚韧和抱负。

他推荐每位学子都去通读几本经典历史著作，“这些著作有着深厚的积淀，当你读完后，会觉得与人云亦云的历史都不一样。如果大学期间，你没有读过几本经典的书，我认为走出校门时，你将会有一种不好意思的感觉。”姚大力笑着说。

“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所贵于历史智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质也。”姚大力借用钱穆的话作为这节课的结束语。

本报记者 赵天润
本报记者 成钊 摄

徐以骅讲述世界宗教百年来的大变局

“我今天讲的可能是大家并不太熟悉的宗教研究，即世界宗教百年大变局。”

春雨初霁，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徐以骅老师站上相辉堂北堂讲台，面向经济、国际金融、国务、法学、社政等五个院系的2023级本科新生开讲“强国之路”思政大课。

不研究宗教 就不懂文化发展史

徐以骅长期从事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1985年3月，他来到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任教，自此结缘复旦。

1986年，经谢希德校长和谭其骧先生等的推荐，徐以骅前往美国名校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宗教学博士学位。他在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即回国服务，亲身见证和参与了我国改革开放和我校不断发展的历程，并且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政议政。

“复旦为我提供了最好的发展平台。”徐以骅至今已在国际政治系任教逾39年，他用“花开花落、无悔今生”八个字，概括他对学校的深厚情感。

徐以骅还记得杨福家老校长的叮嘱：“要好好研究宗教问题。不研究美国宗教，就很难研究美国社会。”在谢希德、杨福家两任

校长的关心下，他先后创建了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等机构，将宗教研究从中国基督教史逐步扩展至美国宗教、宗教与国际关系、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等领域，取得体系化的成果，仅创办和出版的集刊和丛刊就有五套之多。

宗教具有普世性和网络性，在国际关系中具有超强的潜能。徐以骅用“治国理政的试金石”来形容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因素。对我国来说，无论是开创全方位对外开放新局面、实现“一带一路”倡议，还是在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宗教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需要加以系统和科学的研究。

拨开迷雾 看世界宗教“百年变迁”

徐以骅指出，世界宗教的百年变迁，正在冲击甚至颠覆我们对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统认知，重新划分世界宗教的版图，并且引起区域政治、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领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在徐以骅的身后，是一幅世界地图，标示着世界宗教格局的百年变迁，他说，“基督教人口重心的南移，伊斯兰教的非中东化或亚太化的趋势，都非常明显。”

世界宗教百年变迁的突出



▲ 徐以骅教授开讲“强国之路”思政大课

体现，是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人口重心的颠覆性转移。在发展中国日益宗教化，而发达国家日益世俗化的趋势下，宗教的全球化趋势下，宗教的全球化趋势加剧了国际冲突和全球治理难题，正在对现行国际秩序构成巨大挑战。

随着电子通讯和互联网改变宗教传播方式，宗教流通更超越以往任何时期，世界宗教正在加速洗牌。徐以骅引用有关预测数据：“随着人口的变化，预计到2060年，伊斯兰教将取代基督宗教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宗教，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将会成为基督宗教信徒人数最多的地区。”

发展中外关系的基础在民

间，这对推进“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非常重要。徐以骅认为，对外交流除自上而下的官方外交外，还要有来自民间自下而上的推动。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宗教往往是最具民间性、地方性和草根性的存在，宗教民间交流对促进双边和多边关系的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们既要反对“以教干政”，也要反对谈“教”色变。

“高校不仅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阵地，而且应成为教授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无神论思想、我国宗教政策以及正确宗教知识的重要平台，还需要成为宗教领域原创理论和话语的出产地。”课程尾声，徐以骅这样作结。

仅把国际冲突 理解为宗教冲突有悖

互动环节，有同学问：“中国宗教发展是如何对中国国家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都是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徐以骅说，健康的宗教状态也是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组成部分，“中国有近2亿宗教人口，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必须要牢牢团结好这部分人民群众。

有同学以巴以冲突为例问“宗教的学术研究能否对推动宗教冲突解决、促进世界和平发挥作用？”

“这个问题非常好。”徐以骅表示，在巴以冲突等国际问题中，宗教往往只是一个因变量，依附性很强，仅把国际冲突理解为宗教冲突是有误区的。“我们研究宗教，就是要正确认识和评估宗教在国内社会和国际关系中的正负两方面作用，并且逐步建立我国在宗教领域的自主知识、学科和话语体系，弘扬我国宗教圆融中道、谦和宽容的传统智慧，推动我国宗教和宗教团体成为国际关系中和平及进步的力量。”

本报记者 汪祯仪
本报记者 成钊 摄